

史海钩沉

从义学到小学

清代儋州丽泽书院的变迁

唐启社

自宋代以来，书院教育方兴未艾。儋州丽泽书院虽然起步稍晚，但它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丽泽书院一开始只是义学，清朝道光八年(1828年)才创办书院，变成了儋州的官学。清朝末年，又改建为小学。丽泽书院一百一十多位生徒以笈簞酒饯为他饯行。

重修义学 广增声价

义学的兴建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年间。万历十七年(1589年)，琼山进士许子伟在州城东南隅兴建了一间义学，开启了儋州新一代的文风。入清之后，历经朝代鼎革，在加上长时间以来的风雨摧残，许氏义学已经破败不堪。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韩祐始任儋州知州。韩祐是直隶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大兴区)人，由儒学起家。韩祐到任后，他以振兴学校为己任，下定决心改变儋州的教育面貌。

之后，韩祐轻车简从，寻访许氏义学的旧址。当他看到牛羊践踏、草木芜杂，不免心生感慨，过去诵读的場所竟然变成了樵牧的地方。因而，韩祐决定捐俸重修义学。他挑选吉日召集工匠，拓土平基，准备营建的材料。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春天，韩祐动工重修义学，当年秋天落成。

重修之后，建成了一座三进式的院落，义学面貌从此焕然一新。第一进为大门，两侧各置一室。第二进为讲堂，两侧各置二室，韩祐特意为讲堂题匾“丽泽堂”。第三进为正厅，一共设置了三室，奉祀文昌、魁星、朱衣三尊木像。在大门至讲堂、讲堂至正厅的两侧空地上，还修建了若干间厢房作为士子研习的场所。为了明确义学的边界，四周新修建了围墙。

在重修义学过程中，儋州儒学学正文冠斗不仅协同韩祐进行规划布局，还专门撰写了一篇《丽泽堂记》叙述讲堂命名的寓意。儋州吏目李洽、镇南巡检司巡检闫沂、安海巡检司巡检沈守信也参与督造工作，为重修义学出了不少的力气。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韩祐再次捐俸作为延师的费用，聘请州城柔远坊的陈国栋担任义学讲师，“一时多士来游”。州中士绅将这样的功劳归于韩祐，但他却说:“如果没有前人的开拓，尽管有善举也难以彰显出来;如果没有后人的维系，即使有美德也难以传承下去。愿此后主政者热衷维系，关心教育，应时捐资修缮房屋、延师课士，务必使义学永葆生机，经久不衰，这样的话后人的功劳就更大了。”

州中士绅听到这样的回答，无不交口称赞。众人请求说:“这样的话一定要立碑记述，使后人懂得效仿，让义学精神垂范不朽。”韩祐欣然答应，用心撰写了一篇《重修义学记》，文末寄托了他对后来者的希望。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韩祐在重修《儋州志》时开始将义学称为“古儋义学”。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韩祐又捐资首倡文昌胜会，并邀儋州士绅和义学生童量力佐助，后用筹集的善款买置了三间商铺，所收租铺作为春秋二祭的费用。

由私及官 创办书院

古儋义学的再造，为儋州地区培育了不少的人才。乾隆四年(1739年)，儋州士民再次重修义学。此次重修后，众人在丽泽堂前刻立了一通石碑。只可惜，碑阳文字今天已经漫灭难辨。从模糊的字迹中，依稀可见碑额篆文“□□□□重修义学碑记”。碑阳记录了义学重修事宜，并重申义学田收入的规定。碑阴开列义学田庄土名、丁数，和每年租米收入，以便后人更好的维系义学的经

费，保障正常办学。

乾隆年间，儋州举人陈大章屡次被推举为古儋义学山长。陈大章，号耐圃，是王五镇粮料村人。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他在戊子科乡试中考中经元，一时名声大噪。嘉庆年间，陈大章被恩赐为文林郎。他去世后，儋州士民拟请入祀乡贤祠。陈大章掌教古儋义学成绩斐然，《民国儋县志》评价他“载成者众”，义学的名声也得以远扬。

道光七年(1827年)，古儋义学在风雨摧残中倒塌。道光八年(1828年)，儋州士绅重建义学，此后创办“丽泽书院”。在儋州官府的支持下，丽泽书院的性质发生改变，从义学开始跻身官学的行列，办学条件大为改善。

道光年间，文昌举人云茂琨被推举为丽泽书院山长。云茂琨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丙子科乡试中举，咸丰三年(1853年)，他参加癸丑大挑，被评定为第二等举人，拟任广州府三水县(今佛山市三水区)儒学训导。云茂琨离开儋州时，丽泽书院一百一十多位生徒以笈簞酒饯为他饯行。

为了答谢诸生，云茂琨题赠《留别丽泽书院各同学》一诗:“薄植那堪众折衷，私欣遗迹访坡翁。进规欲效他山助，相长还资丽泽功。自笑一官同马料，徒夸万里展雕龙。他年得意珠江道，喜再论文樽酒中。”在诗中，云茂琨的态度非常谦卑，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后学的期盼。在丽泽书院任职期间，云茂琨教绩丕显，《民国文昌县志》赞扬他“乐育者众”。

咸丰、同治年间，文昌举人蔡干东、进士云茂济，琼山进士郑天章相继掌教丽泽书院，使得书院的文风大振。掌教期间，郑天章曾为丽泽书院撰写一副楹联:“丽景绕山川，肇启文风常仰许;泽人从学校，广增声价共瞻韩。”这是一副藏头嵌尾联，上联的“许”指的是许子伟，下联的“韩”指的是韩祐。这副楹联用词考究，对仗工整，巧妙地将书院的办学历史给呈现出来。

光绪年间，儋州举人唐丙章、进士王云清、恩贡周秉忠、拔贡曾毓琰诸位先生相继掌教丽泽书院。这一时期，在一名名流的栽培下，丽泽书院教学成果丰硕，可谓“载成士类，桃李成荫”。

新潮西来 改立小学

晚晴以来，西方社会思潮不断涌入中国。受此影响，丽泽书院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会稽王之翰始任儋州知州。后来，他聘请吴应星担任丽泽书院的院长，改变了书院的教学模式。

吴应星，号铁桥，早年师从周秉忠先生。光绪十四年(1888年)之后，他前往羊城广雅书院求学，前后师从梁鼎芬、朱一新、廖廷相等一众名师，学问大为长进。吴应星曾参加四次乡试，但都未能中举，不过他却不介意，依旧专心研习学业。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吴应星参加丁酉科生员选拔，这次他终于成功考中。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深造多年的吴应星学成归来。

在丽泽书院担任院长期间，吴应星一改往日陈腐的学风，专门以经史实学教授诸生，受到士子们的欢迎，时人尊称他为“经师人师”。不久后，丽泽书院改名为“经济书院”，或许是因为这样的缘故。经济书院为儋州开启了一股新的风气，“知名之士一时称盛”。

《辛丑条约》签订后，面对国内外局势的新变化，清政府借鉴日本的教育改革学制。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中央政府名义制定的全国性学制，但最终并未实施。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首个得到实际推行的现代学制。

癸卯学制确立了一套完整的三段七级学校教育体系。初等教育分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三个层级，修习年限分别为四年、五年、四年。中等教育只设中学堂一个层级，修习年限为五年。高等教育分高等学堂、大学堂、通儒院三个层级，修习年限分别为三年、三至四年、五年。除了普通教育体系外，癸卯学制还重视发展实业教育与师范教育。

此后，儋州的教育体制也随之发生转变。东坡书院改设农学，桄榔书院也在宣统二年(1910年)改为中和高初小学校。这一时期，经济书院是否进行了改制，史籍没有明确的记载。

民国建立后，继续推行学制改革。民国初年，政府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其规定的学制后称“壬戌学制”。在中小学阶段，采用“六三三”分段培养模式，因此该学制也称“六三三学制”。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基本沿用壬戌学制。这时，1935年成书的《民国儋县志》明确记载经济书院已经改为中和镇高小学校。

夏天在蝉声的烦躁里，一天浓似一天地深了。每日清晨，我总要踱步到离家不远的小池塘边坐坐。池塘周遭，几株瘦柳懒洋洋地垂着枝条，柳叶纹丝不动，仿佛也浸在沉沉暑气中难以挣脱。我常坐在石墩上，摇着破旧蒲扇，眼光在池中漫无目的地游移着，像鱼儿在水中浮沉。

今天清晨，天色微明，柳叶似乎仍沉在昨夜的梦里，纹丝不动。我照例坐在石墩之上，扇子轻摇，目光茫然浮荡于水波之上。水面浮着几片翠绿圆叶，睡眠惺忪地随着水波缓缓飘动。忽然，我的目光停住，盯在一处:一茎绿荷之上，昨天犹是青涩的花苞，此时却竟微微张开，那尖尖的角顶，已裂开了一道细缝。我屏住呼吸，心口竟微微跳了起来——它究竟是要开了么?

果然，当太阳渐渐升起，金黄的朝光穿透了笼罩的薄雾，斜斜地射向池面时，那花苞忽然像要孩拱出母腹般，显出极轻的动静:原先紧裹着的青玉色花瓣，竟微微松开了些骨节。它悄无声息地舒展，仿佛在暗中挣脱了无形的束缚。花瓣一层一层，轻轻弹跳着向外打开，内里渐渐透出些娇嫩无比的粉红色来，如新生儿娇嫩的脸颊。终于，当花苞完全绽开之时，那层层花瓣便如一群羞涩的少女，排着队缓缓舒展开腰肢来。一缕若有若无的清香，悄然沁入鼻尖——是了，这正是荷花初绽时那最清雅的气息了。

我几乎看得呆住了，连蒲扇也停在了半空。我忽然想起，这一池荷花，年年开放，年年凋零，谁曾认真留意过一朵花苞究竟在哪个清晨、哪个时辰里悄然绽放呢?生命绽放的珍贵时辰，竟如此轻易地淹没于喧嚣的时光之流里了。

待到中午，日头毒辣辣悬于头顶，我复又踱到池边。那朵荷花此时已全然盛放，在灼灼日光



静静的池塘

(油画)

梁峰作

感悟人生

荷开那时节

曾典初

里，花瓣像是染上了一层釉彩，边缘处闪着粉白的光晕。整朵花在灼灼日光的簇拥下，亭亭立于水面之上，仿佛集拢了满池的骄傲与荣光。几只蜜蜂嗡嗡地绕着花盘飞舞，有的落在花蕊上，贪婪地吮吸着蜜汁。它们的翅膀在阳光下闪烁着金黄的光亮，小小的身躯在花蕊间忙忙碌碌，如同辛勤的园丁在照料自己的珍宝。

我凝神细看，花瓣上竟还缀着几颗晶莹的水珠，映着日光，玲珑剔透，宛如珍珠，想必是昨夜或是今晨的露水吧。水珠在花瓣上滚来滚去，轻轻颤动着，仿佛随时要跌入水中，却又被花瓣的温柔挽留住了片刻。

那朵新荷绽开之后，仿佛给整个池塘注入了新的生气。水面上不知何时又钻出好几支含苞待放的花蕾，如青涩少女般半藏半露在莲叶间;而先前开放的那朵，则如同骄傲的姐姐，在池中撑起一片粉色的明媚。连水里的鱼儿似乎也更活跃了，时而跃出水面，搅起一圈涟漪，时而在荷叶下面穿行，留下一道道细微的银线。池塘便这样被这朵新

开的荷花无声无息地点亮了，正如一盏灯，燃亮之后，原来幽暗的角落便自然被光明注满了。

天色渐晚，薄暮如纱般轻轻笼罩下来，我再次踱步至池边。那朵白日里光彩照人的荷花，此时已显出几分倦意。花瓣微微收拢，边缘开始显出一点枯槁的暗色，似乎已预知了生命流转的节拍。一阵风过，几片花瓣便轻轻飘离花托，像搁浅的小舟般，晃晃悠悠地浮在水面上。它们被水流推着，漂到岸边，便停在那里，不再远行了。

我俯身捞起一片，花瓣依然残留着淡淡粉红，触手却已有些绵软。我默默地将花瓣包在早晨擦汗的旧手帕里。石墩被白日烘烤得灼热，如今却已透出夜凉，我坐在这冰凉的石上，心中也如这暮色一般，渐渐沉静下来。

生命的盛放与凋谢，原本便是如此自然，如四季的轮转，日月的更替。花开花落，是生命无声的言语，也是天地间最朴素而深刻的道理。我凝望池中余花，明日或许它们亦将如此凋谢，然而，凋落却并非消失，而只是生命旅程里的一段安息。

回家的路上，我默默思索，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生命之长短固然难以把握，但如荷花般在属于自己的时节里灿然盛开，这已足矣。明年此日，我坐的石墩许是塌了，但荷花总归要开的，就在这池塘里，在无数个被我们忽略的晨光熹微中，悄无声息地再度绽放。

荷开时节，不过是一朵花从含苞到凋零的短暂时光。然而这花开又落之间，生命早已将最纯粹的美丽交付给了世界——花事虽短，却足够它证明自己活过;原来凋零不是终点，只是生命在时序中换一口气的驿站。

那花开花落间已尽了本分，开花的时辰，才是荷花的永生。

(接上期)

晚上还要借着月光给战士们一件一件地缝补衣裳，也太辛苦了。所以好多战士干脆就将大小破洞洞，用棕缕或细麻绳扎住。今系一个结，明儿又系一个疙瘩，日久天长就把衣服搞成了皱皱巴巴、疙疙瘩瘩的“老牛披肩”(海南下雨时给水牛披的破布)。老百姓见到这支军队，就叫大队长詹汉行“百结先生”，管这支抗日部队的士兵叫“百结军人”，国军见了干脆就耻笑琼纵五大队为“野人军”“乞丐军”，“叫花子大队”，驻琼日本鬼子在往来的电文中，干脆就称其为“野人部队”“猿部队”。

但就是海南的这支“野人部队”，却让日本鬼子吃尽苦头吓破了胆，一提起来就面带惶恐、惊慌失措。

琼纵指战员面对日、伪军疯狂反扑、以及日夜不停地“围剿”和“清山”，尤其是在叛徒汉奸的引导下，部队常常会被敌人四面包围而陷于被动，许多日子都只好躲藏在连野山猪长臂猿都钻不进去的热带雨林中藏身。没有一粒米下锅，没有一个番薯下肚，战士们就在深山野林中挖掘木薯、山薯、木薯还有野生芋头，或蒸或煮或烤或生吃，再用野菜加点儿盐巴汤冲进肠胃。于是顿顿是“山薯大宴”，天天是“野菜全席”，所有战士都是严重营养不良，骨瘦如柴，双目塌陷，面色如土。大日本皇家军人简直不敢想象甚至是百思不得其解，岛上当地几千人的士兵，常年露宿在古木参天、不见天日的原始丛林中，蜗居在没有粮食没有衣服不敢燃火煮炊的竹棚茅草屋里，共产党的士兵是怎样在顽强地坚持着抵抗着。在蚊虫肆虐、蛇蚊毒辣的恶劣环境中，他们

红色长篇小说连载 57

孤岛战旗红

李盛华

冲啊——冲!

冲入日军的阵地，
斩杀倭寇片甲不留。
还我儋州锦绣河山，
冲! 冲!

冲啊——冲!

中共琼崖纵队儋州五大队的抗日英雄们，风餐露宿，破衣烂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但他们却以“儋州铁军”而自誉!这种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及在苦难面前所表现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称赞的那样:“这支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曾经不可一世、张牙舞爪侵略海南岛的日本法西斯，他们听到了《儋州游击队之歌》吗，他们尝到了儋州北岸愚的厉害了吗?现在让他们龟缩在孤零零的几座碉堡里，形影相吊、瑟瑟发抖去吧!

海南琼西的抗日武装行走在阴翳蔽日的热带原始森林之中，露营在泥泞潮湿蚊虫飞舞的“瘴疔之乡”，挖掘山薯木薯以充饥，他们是穿着短衣短裤“百结衣”的农民渔夫，他们也是扛着土枪大刀誓死冲锋的战士。这支困守在孤岛上被大日本皇军称之为“野人部队”“猿部队”的红色军人们，却从来没有失去必胜的信念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決心!正如詹汉行在与自己的战友们

在诗中相唱和的那样:
何去何从各有志,天南地北任徘徊。
卖国求荣千古恨,苟且偷安实可哀。
投机钻营亦可耻,精忠报国是英才。
而今投笔从军去,马革裹尸最开怀!
(未完待续)

牛背上的笛声

刘强

温馨往事

三十年前，顺子是我最崇拜的玩伴。他比我大两岁，因家境贫困，初中未毕业就被迫辍学，帮助家里干些农活，农闲时就牵着一头老水牛放牧。顺子用抓黄鳝卖的钱，买了一根精致的竹笛，常常坐在牛背上吹，笛声婉转悠扬，如春风拂过。

高二暑假伊始的一天傍晚，晚霞如仙子的霓裳缥缈于天空，我循着笛声找到了正在洞湾草地放牛的顺子。他见到我，停止了吹奏，从牛背上跳下来。多日不见，顺子变得面色黝黑，一件花衬衫遮挡不住健硕的体格，短裤下的小腿尽是蚊虫叮咬的疤痕，脚上的拖鞋半是泥浆。

“阿强，放暑假了吧?”顺子微笑着向我打招呼。“嗯。顺子哥，你吹得真好听，这支曲子很耳熟，但我想起叫什么名字。”我说。

“你呀，光知道念书，不会流行歌曲，这首歌叫《外面的世界》，齐秦唱的。”说完，顺子便开始清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笛子很容易吹吗吗?”我端详着那根支竹笛，很是好奇。

“是呀，俗话说‘一日笛子三日箫’，你是不是想学?明天过来我教你，保证很快学会。”顺子拍了拍我的肩膀。

第二天，我从弟弟手中抢过牛绳，主动要求放牛，以便与顺子在一起。牛在草地上吃草，顺子就热心地教我吹笛。他先教吹奏的基础知识，再从《数星星》《小草》等简单的曲调教起。顺子对笛子的原理了如指掌，为了便于教学，他从后园砍了一根细竹，自制了一支笛子，虽然声音没有买来的那支清扬，但可以辅助教学。

就这样，我和顺子形影不离，两头老水牛的背上，两个少年“短笛无腔信口吹”，吸引来很多村民赞许的目光。其实我只是滥竽充数地附和，主要是顺子吹的。

吹累了，我们就躺在草地上，看云朵外的天空，看白鹭划过的雅姿。有一天，顺子无奈地告诉我，他不想这样放牛下去，想去南方打工，可威严的父亲不允许。他建议把牛卖掉，再凑点钱买一台手扶拖拉机，不但可以大大提高农事效率，还可以将他解放出来打工挣钱。顺子还说，因为这事，他跟父亲吵过多次，父亲已有所让步。

“打工很苦的，别去了。”我当然不希望他抛下牛去南方，因为那样就没人教我吹笛子了。

暑假快结束的一天，顺子兴奋地告诉我，他的父亲同意他去南方打工了，他要闯出一条路子来。临别时，顺子把那支心爱的笛子送给了我，嘱咐我好好学习。从那以后，牛背上的我时常将这支竹笛吹响，沙哑的声音像是思念，像是祝福，直至我去了省城读书，又去了外地工作，跟顺子失去了联系。诗人席慕容在《乡愁》里写道:“故土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如今，我眼前时常会出现一幅画面:夕阳余晖中，两头老水牛各自驮着一个翩翩少年，少年手中的竹笛飘出悠扬的乐曲，穿过无垠的旷野，穿过悠长的岁月，在故乡久久回荡。

梦回长安(外一首)

■ 东坡遗风

回到唐朝，只需一盏花灯
推开夜色，唐明皇的恩典
从开元盛世，流淌至今

霓虹闪烁，是泼洒的碎银?
未央宫的月亮失足跌入火锅
辣味的汗珠，正从玄宗鬓角滚落
胡旋舞旋起千年的风
裾摆深处，掖着李白诗稿的残片

今夕的倦意，浮沉
在暗的光，光的暗，无处停泊
灯火推涌着灯火，人潮叠印着人潮
只留下我，一个盛世的过客

◎ 华山论剑

我踏碎千里云浪
站在华山之巅，触摸苍穹的脊梁
云雾翻涌，似江湖恩怨流淌
峭壁如刃，劈开岁月的沧桑
苍龙岭上，我与山风对饮
饮尽这八荒的雄浑，万世的激昂

我张开双臂
拥抱这磅礴的天地
让呼啸的风灌满胸膛

当群峰突然昂首
把身影投向青铜的脊梁
当长风突然停驻
把浩荡编入天地的乐谱
谁的名字，如日轮
悬于断崖
悬于华夏的额顶